

存文八八及則五迷自

江平著
秦湖没題



前 言

2004年，中央统战部同意我辞去了最后的一个工作职衔——中央统战部顾问。我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我们都是中国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的真诚拥护者。比较而言，我完全退下来的时间是较晚的。1986年，我退到了二线，副部长的职务免了但顾问又当了10多年。现在是到了完全休闲的岁月，我想自此之后，可以不再费尽心力写什么东西了，就是说，可以悠闲地安度晚年了。可是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这几年，我还是应邀写了些文章，大部分是为同事、朋友、领导者和良师益友们写的纪念文章。这类文章不仅是应该写的，而且是很愿意写的。另一类是参加了一些必要的会议，在会上讲了话，事后又把它整理成文的。还有几篇早年写的文章，在我出版论文集的时候没有收进去，例如纪念藏族爱国老人喜饶嘉措的文章和题为《关于当前民族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等5篇文章，都是应该收进文集的。现把这5篇作为补遗和近几年写的文章放在一起、共有15篇。烦请辛文波、张蒙纳同志和夫人张瑞棠审阅、校改、编辑成册，起名《八八文存》，因为我今年已经进入88岁了，这也算作一项纪念。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按群众组织的要求写过一篇题为《我的历史》的材料，我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地叙述自己的历史。前年把它翻拣了出来，我看所述事实是

清楚的，因而想在此基础上把我的一生的经历都写出来，主要的不是写个人，而是写亲身经历的事件，写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身参与的民族、统战工作。题目可以叫作《一个长期从事民族工作者的自述》，简略点就叫《江平自述》。

计划写十三节。以 1949 年全国解放为界，分为上篇和下篇。

上篇七节：（一）家庭出身；（二）学历；（三）奔赴延安；（四）毕业于中央党校；（五）青年工作；（六）情报工作；（七）两次西安之行。

下篇六节：（八）统战民族工作之一（1949 年—1953 年在西北局统战部的工作）；（九）统战民族工作之二（1954 年—1970 年在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十）1971 年—1978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十一）民族统战工作之三（1978 年—1982 年在国家民委的工作）；（十二）统战民族工作之四（1982 年—2004 年在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十三）在藏学研究中心的工作和民族理论研究工作。截至目前，我已写了十一节，还有两节尚待完成。我想把已经写成的部分，标题略加改动，改为自述五则：（一）解放前的经历；（二）1949 年—1953 年在西北局统战部的工作；（三）1954 年—1970 年在中央统战部的工作；（四）1971 年—1978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工作；（五）1978 年—1982 年在国家民委的工作。把这些写成的部分和《八八文存》合在一起印出来，供同志们阅提意见，以便从容地撰写后面几节，

也可以写得更好点。

我写这篇自述，是自己感到有此必要，也是接受朋友建议的结果。我们的老部长李维汉同志，生前早就提出，把中央统战部办成各界民主人士之家，把国家民委办成少数民族之家，并且号召我们要广交朋友，交可以谈心的挚友、诤友。十分庆幸的是，我在长期从事统战民族工作中，结交了许多各民族出身的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同他们常相往来，互相帮助，共同工作，调查研究，办成了不少重要的事情，到了老年有几位朋友多次向我提出建议说：“你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参与过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应该把它写出来，留给后来的同事们参考和研究”。我认为这个建议是应该采纳的，应该把那些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大事情都写出来。在写作过程中，我曾将一些章节印送几位同志阅提意见。他们不仅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而且动手作了修改，使这些章节大为增色，表述得更为完美。中国人是讲长寿之道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人到老年必须有朋友常相往来，叙家常，说古今，自由交谈，解惑释疑，即古人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① 每逢“有朋自远方来”，^②

① 陶渊明：《移居》诗之一最后两句。奇文，新奇的文章；疑义，难以理解的文义或问题。《陶渊明集》，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8月北京第1版。

② 《论语》学而篇第一中的第二句。有朋，志同道合的朋友。《论语译注》第1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第2版。

则谈兴更浓，高谈阔论，放浪形骸，“对酒当歌，人生几何”，^①因之远离寂寞，不沾忧郁。此人生之一大乐事也，岂不快哉！

毋用讳言，今年以来我的身体状况是大不如前了，眼不明、耳不聪，手脚都很不灵便了。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因为如此，才决定把写好的部分印出来。要想到人有旦夕祸福嘛！但我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我们共产党人的誓言，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何谓到底，就是死而后已。我坚信已定的计划是一定能够完成的。人活着总是要做点事的，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忙和闲、苦和乐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点忙碌，没有点辛苦，就体验不到休闲的乐趣。我的体会是，每天坚持两三个小时工作和学习，有计划地写点东西，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保持生活的乐趣，保持读书看报的习惯，保持增加知识和更新知识的追求。如果什么也不干了，什么也不写了，每日每时都是休闲，那就会什么兴趣也没有了，这不是健康之路。人活着就不能坐以待毙。至于老得（病得）不能动了，那就只好另当别论。

现在我们的国家蒸蒸日上，全国人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生活日见改善，在这样美好的时日里，

^① 曹操：《短歌行》诗的第一、二两句。当，应当；几何，多少。《曹操集》上册，中华书局1974年12月第1版。

祝愿我们年老的朋友们愉快地健康地多活几年，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

江 平

2007年6月15日

目 录

自述五则

前言	(1)
一、解放前的经历	(3)
二、1949—1953 年在西北局统战部的工作	(37)
三、1954—1970 年在中央统战部的工作	(57)
四、1971—1978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的 工作	(133)
五、1978 年—1982 年在国家民委的工作	(145)

八八文存

江平简历和理论研究 (2003 年 4 月)	(219)
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民族区域自治是何时决定的 (2004 年 2 月 8 日)	(221)
进一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2004 年 6 月)	(227)
永远纪念邓小平 (2004 年 8 月)	(231)
永远怀念杨静仁同志 (2004 年 9 月 18 日)	(239)

致张宽、张翼珍同志书

(2006年2月2日) (244)

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典范

——纪念李维汉同志诞辰110周年

(2006年4月23日) (247)

深切怀念统一战线工作的实干家

——纪念金城同志诞辰100周年

(2006年5月) (252)

李维汉同志研究满族自治问题的两点记述

(2006年8月) (263)

《乌兰夫传》序

(2006年10月) (268)

补遗

认真落实党的民族语文政策

(1980年1月2日) (278)

向雷锋同志学习

(1981年3月5日) (285)

关于当前民族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1982年2月26日) (293)

爱国老人喜饶嘉措大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1994年) (329)

《逸丽奇葩》序

(1997年10月26日) (337)

后记 (339)

自述五则

一、解放前的经历

(一) 家庭出身

我的家在秦岭南麓，丹江源头。地点是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李庙乡张家坳村。我的家乡属于贫穷山区，人民生活贫苦，至今仍然是扶贫重点地区之一，又是革命老根据地之一。这个地区虽然较为贫穷，但风光秀美，林木葱郁，清泉、曲溪、碧潭、飞瀑所在多有。向有八景十观之说，许多著名诗人留下了不少赞美的诗篇。白居易晚年曾三游商州，留下了“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①的名句。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②真实描述了商洛美好的自然景色。

商洛山区河网密布，主要有5条河流，有丹江、洛河、金钱河、乾佑河、洵河。除洛河水系属黄河流域外，

① 白居易：《答崔十八》一诗中的后两句。全诗是：“劳将白叟比黄公，古今由来事不同。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白居易集》第二册，613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1版。

② 温庭筠：《商山早行》一诗中的第三至第六四句。全诗是：“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第三、四句，作者纯用山村十种景物的十个名词组成佳句，有声有色，历来脍炙人口；第五、六两句中槲叶、枳花为商洛特色，槲叶落时，枳花开放。因天未大亮，白色枳花显眼，故用一“明”字。《唐诗鉴赏辞典》112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其余水系均属长江流域。我们的商州城就坐落在丹江之滨，北依金凤、南望龟山，形如翔鹤，故有鹤城之美称。城周的东龙山、静泉山、熊耳山、仙娥山都是很美的。

我的家庭，早年是个地主，是在我的大祖父主持家务的时候发的家。由于他的亲生儿子不成材，他把家业交给侄子即我的父亲来主持。我的父亲名叫张升汉，是比较有才干的。他不仅经营农业，而且兼营商业，还放高利贷，家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他患了肺结核，50多岁就逝世了。我的两位家兄管家后，不善于经营；两人都染上不良嗜好（吸大烟）；两人在西安上中学的时候，恰值军阀刘振华围困西安城，他们在围城中生活了近一年之久，花钱太多。因而使家业很快败落，以至生活难以为继。后来，我大哥因为长于中医，长期以行医为生；二哥戒了烟瘾，以种田为生。土改时他们的阶级成分都定为贫农。

我生于1919年11月19日（夏历10月16日）。^①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我是最小的。我们兄弟三人小名都是父亲起的，大哥叫昆玉，二哥叫昆仑，我叫昆峰。我的大哥大名张希圣，学生时代很有才气，在旧军队当过书记官，在本地当过镇长，晚年写过剧本，是地方有名的中医和书法家，而且思想比较开明。他的大儿子张翼珍，曾担负起养家的重任，到长武县去做生意。我在

^① 我报考高等小学的时候，因为超过了规定年龄，所以少报了1岁，将生于1919年报成1920年，此后填表，都填的是1920年。1958年我二姐来北京同我讲了这个问题，我向组织写了报告，但未改正过来。

陇东工作的时候，翼珍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到陕甘宁边区来看我，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在西安轻工局、机械局工作任处长。我二哥大名张志骞，曾在冯玉祥部队作过事，后在家长期务农，他的女儿张淑幸在新西北印染厂、后在咸阳印染厂当女工，是西安市劳动模范，又是工会工作干部。她将父母亲接来西安一块生活。我的三位姐姐都对我上学有较大的帮助。大姐供我吃饭，二姐供我学费，三姐供我衣服鞋袜。大姐家里原来是较富裕的，姐夫杨修身，是一位很勤快的农民，但他有好赌的习性，几次受人愚弄参加赌博，输了很多钱，致使家道中衰，陷于很贫困的境地。我上黄川完全小学的时候，就是在大姐家里吃饭的。那时他家已经很困难，但是大姐总是设法让我吃好。二姐家里很富有，是个大地主，二姐夫郭树屏主持家务，他为人比较敦厚，供我和他的儿子郭丕基，他的弟弟郭树英同时转学到商县城里去念书。三姐家里也是比较富裕的，三姐夫武鸿汉是黄川小学的教员，他和三姐一直对我关怀备至，我到了延安还收到过他的数次汇款。

父亲逝世的时候，我仅七八岁。大约在1934年，由母亲主持我们三弟兄分了家。我和母亲一起分得土地十亩多点（其中包括给母亲的养老田三亩）房三间，因无劳动力，无大牲畜，靠地租和亲戚帮助过活。

（二）学历

我小的时候，我们村里没有正规小学，只有老者在家庙里办的一所私塾，几张桌凳，一位老师，极为简陋。

既教《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古书，也教“人、手足、刀枪”的课本。我是七岁开始上学的，上的就是村里的私塾。我的母亲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是能认识一些文字的，懂得学习的重要性。她青年时代陪伴父亲复习功课，后来又陪伴儿子们复习功课。《三字经》、《论语》等她大部分都能背出来，而且爱唱民歌。她为我念好书、上好学操尽了心，受尽了艰难。我在本村私塾上了几年，母亲怕误了我的学业，先后送我到屈村小学和府君庙小学读了几年。1935年我考入了本乡的黄川完全小学（当时叫做正本高等小学）。这个学校在商县北乡是办得最好的，大多数教员是较有名气的，有几位还是我的亲戚。有我的堂姐夫杜尚志、谷延年、三姐夫武鸿汉、堂兄张四序等。这个学校校风严整，教学认真、课后自习有监督、有检查。我在这个学校学习了3个学期，学业有了明显的进步。

1936年发生了“双十二事变”，随后红军大量来到我的家乡，有一部分住到了我的家里。从他们（主要是一位指导员）那里知道了革命和抗日的道理，也开始同本乡的进步青年王秉毅等接触，看了一些进步书报。

1937年，因地方闹土匪，社会秩序很不安定，我在二姐夫赞助下转学县城，在商县城内中背街小学读完了高小的最后一个学期。

1937年秋考入商县中学简易师范班。在我上学的时候，家庭生活已经很艰难，所以在学校我一直是一个用功读书的好学生，设想将来当一名小学教员，担负起奉

养老母的责任。考师范班，第一因为这个班是公费的，每个学生每月5元（当时是够吃用的）；第二符合我的志愿。由于商县穷学生多，考上师范班是很不容易的。当年只收甲、乙两个班，共60多人，报名的有几百人，竞争是激烈的。

商县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创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当时叫做商州中学堂，是在“商州书院”的基础上创办的。我考入这个学校的时候，校长叫刘壮武，思想守旧，在学生中印象是不好的。但也有几位思想进步的好教员。在我心目中蒋雄影夫妇是很好的，他们都是东北人。蒋先生给我们教语文，蒋夫人教音乐。蒋夫人在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时候，动了感情，声泪俱下，引起课堂泣不成声，其感人情景至今仍然不能淡忘。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芦沟桥事变”，标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将我们推向亡国灭种的边缘。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全面抗日战争开始了，热血青年已经无法安心读书了。我们学校除了组织宣传活动以外，一些进步同学发起号召报名上前线，带头的是刘焕彩、屈必达、郭建都等7人，学校组织了盛大的欢送会。其实这些同学是去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了学校。时过不久，学校传出校长贪污公款，又出布告阻挠学生的抗日宣传活动。学生会由进步同学刘焕彩、屈必达等出面领导，掀起全校罢课、驱逐贪污校长刘壮武，要求实行战时教

育的学生运动。我在进步同学的带动下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事后知道 1937、1938 年间，中共商洛工委已在商中发展了一些共产党员。当时学生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有的已入了党，有的是民先队员。例如刘焕彩，就是较早早在商县秘密入党的，以后到陕甘宁边区改名丹东、曾任关中分区赤水县保安科长。5 师入陕后，调回家乡，任鄂豫陕边区商东县委书记，在与敌战斗中光荣牺牲。我就是在这个期间参加民先队的。

1937 年寒假，我参加了旅省同学工作团。这是我们家乡一些在西安读书的进步同学组成的团体，任务是采用演戏、说唱、讲演等形式到各乡镇宣传抗日救亡，誓死不做亡国奴。在这次活动中，同我关系很好的几个同学——魏振业、闵思颜、殷志华等和我商定，春节后一同去延安。只有我没有如期成行，因为我和母亲是相依为命的，当时没有征得母亲的同意。1938 年春，魏振业（改名魏始成）、闵思颜到了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他们为我寄来了抗大、陕公的入学介绍信和介绍延安的进步书刊。

闵思颜抗大结业后，去了华北敌后，一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解放后他的家人和我都估计他是牺牲了。魏振业抗大毕业后，请假到西安治病，因身份暴露，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劳动营住了几年，解放后在商县中学当教员。殷志华没有到抗大，而是去了安吴堡青训班，结业后在三原县新华书店工作，后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西安劳动营住了 4—5 年。解放初到临潼县当小学

教员。

(三) 奔赴延安

1938年上半年，我继续在商中师范班上学。暑假期间，去延安的事，终于得到母亲的同意。先是大哥和他的大儿子张翼珍看了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介绍材料，热情支持我尽快前往，还建议去陕公，偏重学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便不再坚持己见了。于是我离开了家庭，由侄子张翼珍送到县城，然后到了西安。

1938年7月，我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名去延安抗大，办事处的同志建议我去陕公分校，地址在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栒邑县的看花宫。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不几天，我们一行30余人便从西安向栒邑的看花宫进发了。

一路上，我们兴高采烈，歌声不断。每个同学心里都明白，我们不是一般的旅行，而是走在抗战到底的征途中。不曾想，我们刚到咸阳就被国民党县党部的人扣留了。我们先到一个小学的院内休息，商量如何对付他们。同学们推举我和另一位云南籍的名叫江深的同学作代表，去和国民党交涉，坚决要求放行。我们同县党部人员争吵了几个小时，从中午直到太阳偏西，谈判毫无结果。后来，小学的一位老师告诉我们，你们的同学已被国民党军警强制押走了。继续谈判已无意义，我和江深同学商定，即刻赶到西安向八路军办事处报告，请办事处设法营救。待我们从咸阳步行到西安，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八路军办事处几经交涉，仍然毫无结果。